拿什么告别城市街巷那“步步惊心”

本报评论员 林琳

社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地下空间的开发、管理必须科学、谨慎，不能有丝毫大意。任何城市和相关管理部门都应该有针对性地、有前瞻性地去预防地陷的发生。让百姓每天都能安心地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城市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据新华社1月14日报道，1月13日傍晚发生在青海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的路面坍塌事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经核查，该事故死亡人员由6人上升至9人，受伤人员由15人上升至17人。截至14日晚，已找到9名遇难群众遗体。

路面塌陷的整个过程，让诸多人隔着手机屏幕都感到了害怕和震惊。对当事者来说，地陷可谓“飞来横祸”。对城市来说，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尚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走着走着，人就没了”，西宁地陷事件并非孤例。1月10日，广州地陷3名失联人员的遗体在事发41天后被找到。《全国地质灾害通报》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我国每年发生的地面塌陷事件在两三百起；《2018年10月－2019年9月全国地下管线事故分析报告》显示，这期间公开新闻中可收集到的全国地面塌陷事故共142起。

有专业人士表示，近5年来，城市道路塌陷已逐步进入全国性灾害集中爆发的高峰期，从沿海到内陆边远地区，从一线大城市到二线、三线中小城市，都面临着不断发生道路塌陷灾害的威胁。这与公众的感受基本一致。

地面塌陷事故频发，原因何在？

有的是因为地下排水管道的影响——年久失修的地下水管，如果发生了腐蚀、渗漏或者爆裂，水体就会不断渗入土层，造成地面塌陷；有的是因为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地下施工扰动原有的地下土层，使地下土体形成疏松带、松散区；有的是地质结构特点遇到特定气候所致，比如降雨过大，使得松散沉积物孔隙处于饱和状态，砂砾石间的摩擦力相对减小；有的是地下水开采过度，造成地下土壤含水层压力失衡；还有的是路面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禁不起“风吹草动”……不难发现，人为的因素占据了不小比例。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建设施工频繁的现实语境下，地陷不能更不该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病”，“步步惊心”不该成为悬在城市百姓心头的痛。

上述提到的人为因素，恰恰是城市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地下管线的建设、维护近年来广受关注，只是此前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反复施工、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导致的交通拥堵，路面“拉链”；不少地方积极向地下要空间，修地铁，修各种地下设施、场所，但野蛮施工、不科学施工不时上演，等等。

地下空间当然可以大有作为，关键是其开发、管理必须科学、谨慎，不能有丝毫大意。事故发生往往都是一瞬间，但问题和病因却是积蓄已久，压死骆驼的绝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量变引起的质变。

地陷并非不治之症，人为因素完全可以被遏制。技术层面，雷达可以探测道路空洞，这种探测应更常态化，并且应根据各地地质结构特点、天气情况，确定探测频次和范围；人力执行层面，老旧管线的检查与维修应该做细、做实，道路沉降及管线变形要定期检测；城市规划层面，要按照地质条件的不同，作不同的规划和地基处理方案；还可以考虑建立城市地质灾害数据库，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等。

事实上，有些城市已经走在了前面。2013年，深圳在连续发生多起路面塌陷事件后，由水务部门牵头开始了大规模的管网排查和重修，也促成了“地防办”（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诞生，由其负责协调全市的地面坍塌防治事宜。同年，北京市地下管线周边土体病害检测项目管理指南印发试行，次年，该市召开地下管线综合检测成果通报会，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采取相应处置措施，预防地下管线事故和道路事故发生。

对于地陷，任何城市和相关管理部门都不能心存侥幸，也不能坐以待毙，而应该有针对性地、有前瞻性地去预防地陷发生。一句话，让百姓每天都能安心地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城市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2月2日加班”，成人之美的服务更有温度

杨朝清

202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被不少网友称为“爱你爱你对称日”，寓意长长久久，因而不少新人希望在这一天登记结婚。问题是，当天是周日，婚姻登记机关不上班。四川成都、浙江杭州等地婚姻登记处表示，愿意为民众的需求而加班。（见1月13日《成都商报》）

2020年2月2日被人为赋予了特殊的符号意义，既有传统文化讲究“和合”的文化基因，也有现代流行文化的影子。因而，不少年轻人希望公共部门能够在“最佳领证日”满足他们的心愿。

法定节假日，工作人员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面对公众强烈诉求，究竟是拿制度和规则维护自己的休息权益，还是让渡权利成人之美？“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面对民意，加班还是不加班，折射出不同的“意义之网”。在理性的认识里，2020年2月2日只是人生中普通的一天。只不过，百姓有自己的精神诉求与情感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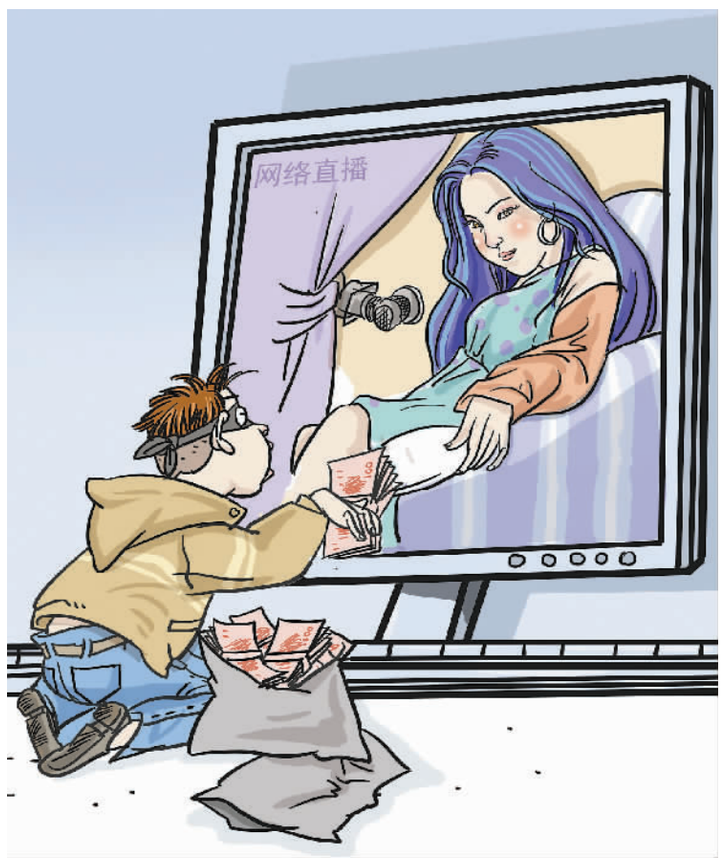
婚姻登记有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性，需要一定的仪式感。许多年轻人在婚姻登记时都会挑个好日子，寄托某种祝福与期盼。2020年2月2日，恰恰贴合了人们的期许。

听到年轻人的心声，公共部门“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是一种主动作为，无疑会赢得更多百姓对公共服务的尊重与认同。

公共服务的良性运行既需要制度化和规范化，也需要一定的人性化空间，去触摸人间烟火。正如有的民政部门在表示加班时，还加上一句“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人情味的公共服务，会让公众觉得贴心和暖心。

有人担心，特殊的人性化举措会被滥用，异化为“满足任性化需求”，让工作人员不堪重负。其实，这样的特殊日子着实不多。让渡自己的权利来成人之美，有温度、有情感、有烟火气息，值得点赞。

图说



打赏之惑

有些粉丝打赏直播平台已经“走火入魔”——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被告人肖某没有工作，身无分文，却想在直播平台“挥金如土”，为此，他先是小偷小摸，后又实施诈骗，最终落入法网。2017年以来，仅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就办理了涉“粉丝经济”乱象案件17件。

随着直播平台的发展和网红文化兴盛，不少主播借此一夜暴富，这令个别主播动起了歪脑筋：诱导打赏、售卖三无产品甚至散布非法广告，一次又一次在法律边缘试探。粉丝追星是其自由，但理性、不盲从应是其底线。关键在于，个别主播与平台绞尽脑汁、不惜违法来让粉丝掏腰包等不良直播生态必须得到规制。如何让平台坚守行业底线、依法依规经营，如何健全主播黑名单制度和直播内容审核机制等，都是摆在监管面前的考验。为此，可利用大数据筛选研判，统一证据采集和法律适用标准，提升打击精准度。

赵春青/图 弓长/文

国资划转充实社保，有个“进度表”很重要

吴学安

日前，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分别在上交所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称，财政部将其持有该行股权的10%一次性划转给社保基金会持有。有专家表示，“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必然影响到社保基金的收入。把国企收益或者股份划转给社保基金具有重要意义。”（见1月13日《证券日报》）

此前，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有难度的企业可于2020年底前完成；在地方层面，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伴随老龄化社会和养老金缺口的压力，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早日出台相关办法已成必需，一方面，不仅可以缓解养老金收支矛盾和财政压力，更为下一步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推行延迟退休、缩小养老金待遇差距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社保基金成立初期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之一即国有股的减转持，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接近尾声，社保基金需要拓展新的筹资渠道。

养老金收支压力大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多年前，企业职工及用人单位均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作为“视同缴费”来对待。199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后，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开始实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划转国资充实社保本质上也是一种还账。一方面，虽然我国养老金从“双轨制”改革为“一轨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还存在不同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差距问题。逐步缩小两者的待遇差距，需要养老金有稳定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过去国企红利较少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这次改革更多体现的是国有资产如何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伴随着国资划转充实社保顶层设计出台，同步建立和完善全国社保基金预算体系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尽快启动社保基金中长期预算，针对未来5年乃至10年的社保基金缺口进行测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总之，国资划转充实社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制度上的“补窟窿”，更是社保制度改革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因这样，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希望这个好政策、好办法有明确的进度安排和推进措施，及早落地。

握紧它，那只能带来力量与公道的“手”

现场·我在我思

卢越

上周，一个亲戚说他父亲在小区被建筑材料绊倒受伤，不知道该找谁担责。我建议他上12348中国法律服务网咨询，那里有律师人工解答。没多久，他告诉我说，有律师解答了他的问题。

去年，司法部宣布在12348中国法律服务网开设“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对寻求法律援助的被欠薪农民工免于经济困难条件审查，当天申请、受理、审批，当天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简单理解就是让打不起官司的困难群体打得起官司，为弱势群体主张合法的权益。农民工是法律援助的最大受援群体。

“2014年的欠薪可以要回来吗？”“我父亲在工地上从个人手里接活干，至今未收到欠款”……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一个个咨询问题背后传递出的焦虑、无助、气愤，透过屏幕也能感觉得到。

“这些农民工的问题，法律援助能解决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叶进国——一位我采访过的法援律师。他告诉我：“能，只要你肯相信。”

法律援助不收费，很多人不理解——“不收费，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办事？”有人认为找律师不管用，坚持上访。对于质疑，叶进国的做法听起来挺笨的：一遍遍地解释政策，一个个地摆成功案例。说完了就是做，花好几个月反复磋商、调解，最后让农民工手里攥着钱了——谁还能不信？

他和同事每年接手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达四五百件，涉及农民工1000多人，基本上都是为讨薪。他所在的广东省暖心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代理的一起案件，为562名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纠纷提供法律援助，入选司法部发布的2019年度法律援助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信任感的建立来得不易，也来得实在。在这起讨薪案中，他们帮农民工拿到了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480多万元。之后便接连收到农民工的谢礼：鸡蛋、鸭蛋和苹果。

示范效应很快体现出来：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张三通过法律援助拿到了被欠薪酬，告诉了老乡李四，李四遇到事也愿意求助法援。接受法律援助后，农民工会发现法律援助“挺管用”——从质疑、抵触，到更多人的相信，这是一个过程。法援律师告诉我，做法律援助会上瘾，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种被信任之后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以往，一些农民工为了能拿到钱，往往愿意让步，“私了”。但结果往往只能拿到被拖欠的工资款。如今求助法援律师，除了讨回工资款，还能拿到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这超出了农民工的期待。这并非律师个人多有能耐，法律规定原本就在那里。说到底，与其说信人，不如说是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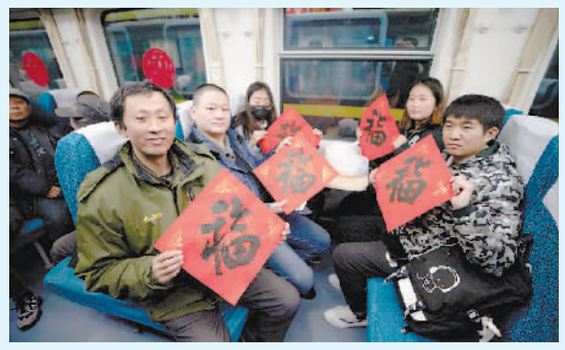
叶进国从2010年开始做法律援助志愿律师，10年来，政策更加完善、普法宣传力度也在加强。“有困难，求法援”成为越来越多被欠薪农民工的首选。去年7月，《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公布，提出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成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

一张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已然全面铺开。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渠道也多起来了，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端都可直达“绿色通道”。通道的另一端，叶进国们就在那里。

遇到麻烦事，法律援助的手可以握紧你、支持你，给你力量与公道。

融媒作品选粹

背上行囊 踏上归途



1月10日，2020年春运大幕拉开。春运首日，记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看到，旅客们带着满满行囊踏上了归家的旅途。无论身在何方，每年这个时候，“回家”都是最动人的词语。面对记者镜头，旅客们兴奋地喊出“我要回家啦！”

（本报记者 刘静 曲欣悦 曹玥 王伟伟 实习记者 史宏宇）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春运大幕开启，我们要回家啦！》

一手托两家，听听家政经纪人的故事

一头系着客户期待，另一头要帮助家政工找到合适的工作——行内人说，家政经纪人是客户与家政阿姨之间的“红娘”。对很多阿姨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份情感劳动。“顾客既然花钱买体验，我们就要拿出高质量的服务。”一位家政经纪人说。

为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努力、辛勤耕耘的他们点赞！

（本报记者 苏墨 王伟伟 张子谕）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一手托两家，听听家政经纪人的故事》

春运卧具洗涤车间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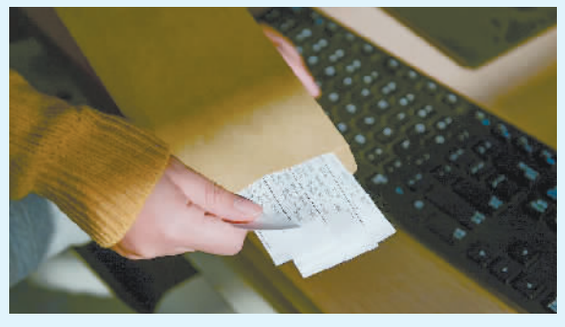
春运已至，记者近日探访了重庆客运段卧具洗涤车间。该车间负责终点到重庆的各次列车的卧具洗涤任务。每天，使用过的卧具会被送至车间，经过分拣、机器洗涤、消毒、熨烫、打包等工序后，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回到列车上。

洗涤工们坚守在洗衣机、熨烫机前，为旅客们能享受到干净卫生的列车环境而努力。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苏志刚）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揭秘2020年春运卧具洗涤车间》

在单位，能互相打听工资吗？



日前，《工人日报》刊发的《好奇同事工资，我能打听吗？》新闻登上网络热搜，工资条再次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工资条能不能在社交圈里晒？员工能不能相互打听工资？企业能不能据此开除员工？一起来看答案。

（文/本报记者 贺少成 图/本报记者 吴凡）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你的工资条，在单位里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文字整理：赵琛